

红色的洗礼

——纪念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六十周年深圳市战友回忆录



(第一集下册)

深圳市史志办
深圳市原粤赣湘边纵队战友联谊会

红色的洗礼

交通 税 站 篇

(第一集下册)

一切为了党的事业

罗许月

一、我是“月姐”

我1917年出生于香港新界沙头角南涌罗屋村，少年时家境还比较殷实。我在家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位大姐，下面是三个弟弟，最小的是个妹妹，生活基本上还是衣食无忧。

241

我的父母亲很开明，相当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不仅我的三个弟弟自幼被送入学堂，饱读诗书，以至到大学毕业。而且，不顾别人非议，也让我在8、9岁时进入私塾，后来还读到小学毕业。这在当时很不简单，我们周围五、六条村庄，只有我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的书。

由于父母的开明，弟弟们读书比

较多，在学校里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又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很早就投身革命，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最初，是二弟罗汝澄先行动起来，投入了革命的队伍，随后三弟罗欧锋、大弟弟罗汝中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我们中国，全国广大的热血青年都奋起参加抗日。有的拿起武器与日本鬼血战，有的在后方发动群众，保障供给。

1941年底，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面对如此惨烈的人祸灾难，我也毅然奋起，在弟弟的引荐下，投身革命。组织上也帮我把罗乙昭的名字改为罗许月。

这时，我已二十四、五岁，身边的同志除了少数领导，大多都比我年纪小，而且我是当时已成为领导的罗汝澄、罗欧锋的姐姐，所以大伙都自然而然地喊我作“月姐”。从此，“月姐”这个名字就在同志们中间传开了，并且一直沿用到六、七十年后的今天。

不久，我成为了东江纵队在香港东部交通站的负责人，保障香港大埔至内地抗日游击区的交通线畅通，影响更大，名气也渐渐更响，连纵队领导们也都亲切地称呼我为“月姐”。

同时，日本鬼和汉奸也开始注意我们，我的名字早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千方百计地想抓住我，破坏我们的交通线。但是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们的阴谋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按国共“双十协定”，北撤山东，我奉命留下来，自筹经费，坚持革命。当



1947年，组织上决定恢复武装斗争，我很快就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活动更积极，效率更高，“月姐”的名字也更加响亮地流传在惠东宝这片热土上。

二、红石门畔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的一部分领导和战友奉上级命令，按国共“双十协定”在沙鱼涌登上美国军舰，北撤到山东烟台。然而，东江纵队一万一千多名同志，只让二千五、六百人北撤，剩下来的将近一万人都只能原地复员、解散、自谋生路。

作为声名显赫的交通站长，当时我根本无法再“复员”了，敌人已像猎犬一般死死盯上了我，而且他们还采取那些“五户联保”“强迫自新”之类残酷政策，妄图迫使人民群众疏远我们，不敢与我们来往，从而困死我们。

243

当时，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即使有许多群众真心地愿意帮助我，我也不愿意很明显地接近他们，生怕因为自己的身份，会牵连他们受苦受难，甚至惹上杀身之祸。

怎么办呢？我们最善长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制胜法宝，这时都不方便使用了。主力北撤之后，人民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时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国统区，流落到香港的人员数量也相当可观，组织上的经费自然十分紧张，我再向上级

伸手？既不是我“月姐”的风格，也十分地不现实。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决定自力更生，依靠我们的双手，开展生产，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我把一部分原来交通站的同志以及其他部门机构的同志组织起来，在香港新界一处荒僻的地区——红石门，开展生产活动，进行自救和隐蔽待命，结果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红石门，位于香港新界一处荒僻的海湾，从深圳过去，要先到沙头角，然后转往鸭洲，之后再到达吉澳，最后到荔枝窝海边。记得从荔枝窝开始，仿佛还需要再坐一程船，才能到达红石门。加之当年交通十分闭塞，除了当地农民群众，外人很少前往红石门。

我和同志们在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荒种地，下海打鱼，生活虽然清贫艰苦，但温饱问题解决了，同时也避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当时反动的港英当局的迫害，过上了相对安全平静的生活，一直坚持到1946年底，上级党组织发来“重建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的指示。

三、我的战士

我们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之后，人人欢欣鼓舞。我们虽然地处偏僻，但敌人的暴行逆施和战友群众惨遭迫害甚至杀戮的消息，仍然不时传来，激起我们满腔的义愤，大家早就摩拳擦掌，希望赶快拿起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报仇雪恨了。

而且我们也不服气，当初，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



国民党的部队望风而逃，是我们东江纵队在华南敌后甚至港澳的敌人腹地坚持战斗，英勇杀敌，最终打败了他们，赶走了侵略者。而当初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军队如今耀武扬威地回来了，还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这些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拿起武器来和他们战斗呢？那么凶恶的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难道还要怕这些“痾痾鸡”吗？

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可以重新拿起武器，扬眉吐气地和这些残暴的敌人作战了，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接到上级指示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将抗战期间非常活跃，作用极大的交通站恢复了，我仍然担任站长。

除了我们一起在红石门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在其他地方隐蔽待命的同志也都闻风赶来。我把大家组织好，按照上级的指示，恢复了香港大埔至内地惠东宝地区东片的交通线，及时地引送人员、物资和情报进入内地的游击区，协助领导同志和武装部队的战友恢复建立革命根据地。

大约是在1947年春天，内地的游击区和部分人民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交通站归入“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二大队”，我继续担任总站长。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的交通站也发展很快，远远超出了抗日战争时期，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达到了五、六百人。

我的这些战士都非常年轻，很少有超过20岁的，大

多都是13、4岁的小鬼，他们多数出身贫苦，对旧社会的黑暗不公，对“痾痾鸡”的贪婪残暴都有过切身体会，所以革命非常坚决。

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灵活，许多交通员都能在面对敌人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可以机智巧妙地应付敌人的盘查，及时安全地将部队所需的情报送达指定地点。

其中不少同志还能审时度势，保护我们人员和物资安全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为保障我们部队的战斗胜利屡建奇功。

与此同时，我们交通站还经常把我们优秀的交通员输送到包括战斗部队在内的其他单位，充实他们的力量，赢取更大的胜利，为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提升贡献很大。

而且，我的小鬼们，无论是留下来坚持交通站工作的，还是输送到其他部门的，在经历过革命战争和艰苦岁月的考验之后，都成长起来，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

多少年来，我的这些小鬼，一直是我的骄傲，我的牵挂，时至今日，只要静下心来，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一起生活战斗的情景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四、我和爱女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个人的婚姻问题一拖再拖，直到1946年岁末，我才和搞地下情报工作的黄翔同



志结为夫妇。

在那个时代，我到这个年纪才结婚，已经算是老姑娘了，但是我们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因为我们俩人的感情非常好。黄翔同志长得很英俊，而且家庭成员也都大多参加了革命，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虽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见面的机会也比较难得，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幸福，既有革命，也有爱情。

恢复武装斗争之后，工作更加忙碌了，我们能聚在一起的机会也更少了，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我们的爱情，不久，我们开始产生出爱情的结晶——我怀孕了。

在怀孕期间，我的工作丝毫没有停顿下来，甚至比没有怀孕之前的工作量更大。当时自己安慰自己：现在好好工作，自己这个大人苦点累点不要紧，将来孩子出生了，我再好好地补偿他。

1948年的夏天，我的肚子越来越大，可部队的工作越来越繁忙。我一直坚守在交通站的工作岗位上，也没有人要求我必须怎么样，但是我总是暗暗地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为了我们的孩子，明天可以生活在更好的社会里，我今天就是多吃一点苦，多冒一些险，也是应该的！

就要到预产期了，组织上和领导们不时来提醒我，要我尽快将手头的工作安排给其他同志，一定要确保大人和孩子的安全，我虽然心中总是放不下肩上的工作，但还是领受了组织上的关心和照顾，将一切交代妥当之后，服从上级的安排，回到了香港新界的老家下产。

当时情况已经相当紧张了，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要

临盆了，令爱人和亲属们都相当担心。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还是平安地诞下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婴，她就是我的长女黄小萍。

孩子的出生，令我切身地感到了做一个母亲的痛苦和幸福。当时在香港的医疗条件比内地乡村甚至城镇要好许多，但和如今相比还是差得远，所以那时人们都说，妇女们每次生孩子，都无疑是闯一次鬼门关！我们平安地闯过来了。

在家里坐月子的那些时日里，我看着孩子粉嘟嘟的小脸，看着她表情丰富的神态，摸着她柔柔的小手、小脚，品味着她吸吮乳头时的感觉，体会她在我怀中挣动的……甚至给她擦屁股，更换尿布，都是一些难以言喻的美好享受。

我不顾身体虚弱，满心欢喜地为她忙进忙出，暂时将外边残酷的现实抛到了脑后，在那段不长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的身和心都深深地和女儿交融在一起。当时我想：从此以后，还有什么能够把我和我的孩子分开呢？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格外地短暂，一转眼，从生产孩子的那一刻开始，光阴已经飞逝了40个昼夜，而我则根本没有感觉到，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幸福之中。

但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况且那还是战争年代，是人民群众争取解放、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异常惨烈的年代。一位不期而至的交通员，把这一切现实又拉回到我的面前。他送来了一张字条，一份上级领导的召唤：“月姐，见字即刻回来，祁



烽。”

我手拿着字条，再看看怀中的孩子，不禁顿时泪如泉涌。我心疼孩子是一种本能，她这么小就要与我分离，怎么会让我不难过？可我是一名战士，而且是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上级的召唤就是命令，就是冲锋号，我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弃一切，即使面对刀山火海，也必须勇敢地发起冲击！

我小心地将字条收好，一边流着泪，一边着手为孩子今后的生活进行安排。我忍着心疼抱着孩子连夜去找那个在香港生活的好姐妹阿倪。我找到她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我将孩子托付给她，泪流满脸恳请她帮助照顾，请她无论如何要好好待我的女儿……她也哭了。在她眼里，我历来是一个坚强的大姐，现在居然哭成这样，她心也很难过。她把孩子抱过去非常坚定地向我保证：我阿倪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后来，在把孩子交还给我婆家之前，她确实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照顾起来。

249

第二天一大早，我只是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香港大埔登船，告别我的家乡，我的孩子，踏上返回游击区部队驻地的征途。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不知多少次的往返家乡与内地的游击区，但从来没有一次好象今天这么难受，因为今天我所要告别的不仅是故乡，更关键的还有我的女儿，而且她还那么小，出生仅仅四十天，就要和她的妈妈分别……

我的泪水哗哗地涌出来，怎么也收不住，我也知道

这样让人看见不好，尤其是自己的同志。身为一个领导，哭成这个样子，影响会是怎样呢？我拼命地想把眼泪收住，可怎么也没办法让泪水不再向外涌。说句心里话，我这不停涌出的哪里是什么女人的泪水，分明是一个母亲心头上淌出的血呵！我太心疼我的女儿了！

我就这样一路流着泪水，从香港大埔流到了坪山游击区部队驻地，一路乘船、坐车、走路，几乎整整一天，眼睛都哭肿了，就是没办法呵！于是我就这样含着泪，拼命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

当时，宋子文在广东发动第二次大清剿，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必须做好全面防范。这样形势下的情报和交通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工作量也必然骤增，领导要求我即刻赶回来的确是形势变化的需要。

在这个时期，我在工作中，不仅要强忍对女儿的思念、担心等许多心理上的痛苦，同时也要面对一个哺乳妇女突然断奶，所带来生理上的种种痛苦和不便，最初的日子里，我的乳房总是肿胀的非常难过，经常会疼痛得难以忍受，加之生活在野外，我不得不时常躲进树丛，想方设法地将奶水挤出来，减轻一点痛苦。可是每次挤过之后不久，又会胀起来，甚至胀的更厉害。

最后，还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找了一位土医生，开了一方回奶药，服过之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部队之后，部队领导非常体谅我的苦楚，经常找我谈话，了解我的实际困难，并且在部队经费非常紧张的条件下，团长李群芳特意批准每月拨出60元港币，作为我女儿小萍的生活费。

我心中既感动又为难。身为交通总站长，明明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部队有多么困难，首长还要挤出这笔钱来抚养我的女儿，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因为当时每个战士每月的津贴只有二、三元钱呵！但是如果没有这笔钱，女儿的生活又怎么办呢？香港的花费比内地要高多了……虽然有思想斗争，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婉拒首长的好意，不要这笔钱。

李群芳团长得知后，专门把我找去谈话，一方面表扬我一心为部队着想，一方面又批评我考虑得不够全面和长远，“……要知道，孩子是我们革命的后代，只有我们的后代茁壮成长，我们的革命才有最后胜利的希望……”他最终坚持每月给我的女儿送去60元港币的生活费，并且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女儿回到我们身边。

后来，李群芳团长又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专门派出江瑞霞同志到我的家乡，负责照顾我女儿的起居饮食基本生活。

251

江瑞霞同志也是一位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原本也在香港居住，后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来，她和家人一起逃难回内地，结果途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全家八口人只剩下她一人幸免于难，其他亲人连尸首都找不到了。

当时，她年纪还很小，被人家收留了做童养媳，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她长大了，专门跑出来投奔革命，参加了我们的部队，现在团首长把照顾我的女儿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她，她便以一名战士接到命令的责任感来完成这项工作。

她对我的女儿很好，很尽心，在她专门负责照顾女儿之前，大家虽然也对我的女儿很好，但毕竟没有专人专责，孩子经常被转来转去，很容易发生一些意外。其中最让我心疼的一次，就是女儿刚学会爬的时候，由于看管疏乎，她爬到了锅灶下，让烧得通红的铁烧火棍烫伤了大腿，时至近六十年后的今天，她腿上还清晰地烙着那时的伤痕。那次烫伤，几乎要了她的小命！

江瑞霞去照顾小萍之后，女儿的情况好了许多，我也更安心地努力工作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她和女儿以及我们全家人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直至今天，还象亲人般地时常往来，亲如一家。

回顾自己参加革命的人生，我想和幼小女儿的那些离别，可以算是最严峻的考验之一了。

五、为了革命

在解放战争那段峥嵘的岁月中，我们为了革命可以说什么都愿意无条件地奉献出来。

身为边纵东一支二团交通总站的总站长，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而我们的那五、六百位交通员的事迹也非常感人，尤其那些十三、四岁的小鬼们，真是可歌可泣。可以想象得出，他们都还是孩子，如果是和平年代，大多数还在父母大人的羽翼下撒娇呢，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们却都早早地就成为了英勇的战士。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补充到了战斗部队，成为真正扛枪杀敌的勇士。即使在我们交通站时，也是无论白天黑

夜、刮风下雨，不管崎岖山路，泥泞小径，还是通衢大道，面对敌人，都能从容应对，不怕艰辛，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革命，我和爱人黄翔以及各自的许多家人，都投身进那热火朝天的人民解放事业之中，为党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也得到了党和国家最终的肯定。

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虽然也曾遭遇过一些挫折和委屈，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

一个女交通员的故事

钟吐婵口述 陈德基执笔

一、苦难的岁月

1927年农历7月18日，我出生在广东宝安沙井镇沙头村一个贫民的家庭里。家里赤贫，没有半分田地，父亲被迫要到香港一间船厂工作。他的工钱很少，除了能维持自己两餐外，极少寄钱回家。母亲在村里帮人打短工来养活奶奶、姐姐和我。

姐姐比我大十多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我大约5岁时，她就被嫁到邻村（壘岗）去了。她的夫家也很穷，也是收完稻谷无米煮，自然没有能力照顾外家。而且过分辛劳，在她27岁时就因穷病交加而凄惨辞世。

我母亲由于常年吃糠菜，总是裹



不了腹，还得长年劳累，照顾家庭，到我6岁那年就在贫病交迫下悲惨地死去，那时她不过35岁左右。她死时脸黄如蜡，全身浮肿，这是因极度缺乏营养和温饱导致患病而死的，给我留下永世难忘的印象！

母亲死时，父亲回来了，但是两手空空，根本没有钱埋葬母亲，被迫将家里唯一的祖屋变卖了。办了母亲的后事，父亲又去了香港，家里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人了。

没有房子住，只得向同村的叔公借一间柴房栖身。为了生活，奶奶便帮人打零工，有时没工做，就只好四处乞讨，有一餐无一餐地勉强糊口。祖孙二人，就是这样的相依为命过日子。

在我13岁时，父亲带着一身疾病从香港回来了。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住食都十分困难，哪里还有钱给父亲看病呢？这样，祖母就只好看着一身疾病的儿子，我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眼睁睁死去。

255

为了埋葬父亲，奶奶向沙井一位有钱的亲戚借来95块毫洋，办理了父亲后事。谁知仅过了三个月，这位亲戚就催我们还债。他看到我家确实没有钱归还时，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说我可以到他家做工来抵债，又说可以包我吃饭穿衣。

我的奶奶虽然舍不得。但想到我到他家之后，有吃有穿，胜过在家里啃糠菜和受冻饿，所以就同意了。我与奶奶分别时，哭得死去活来。

到了那亲戚家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奴婢。白天干着沉重的家务工作，两餐要伺候主人吃饭，天热时还要摇